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

HUSHI YU GUOMORUO SIXIANG
BIJIAO YANJIU

比较研究

杜蒸民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HUSHI YU
GUOMORUO
SIXIANG
BIJIAO YANJIU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 比较研究

杜蒸民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比较研究/杜蒸民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98-0635-7

I. ①胡… II. ①杜… III. ①胡适(1891—1962)—思想评论 ②郭沫若(1892—1978)—思想评论
IV. ①K825. 4 ②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518 号

书 名: 胡 适 与 郭 沫 若 思 想 比 较 研 究

作 者: 杜蒸民

责任编辑: 高秀清 刘荣刚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8mm×210mm 1/32

字 数: 333 千字

印 张: 14.25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635-7

定 价: 2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前 言

胡适与郭沫若由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哲学思想、所受教育以及文化个性不同，他们在先后登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以后，就逐渐在政治上、思想上、文艺上和学术上产生了分歧和对立。正是在这种对立和论争中，郭沫若扬弃了胡适思想、学术中许多过时的错误的东西，吸取了其中许多正确的合理的因素，实现了对胡适的多方面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郭沫若创建的学术体系，已吸纳了胡适在内的前辈、同辈学者的许多有益成果。

说郭沫若在文化学术上超越胡适，当然不是说在一切方面均超越，更不是说郭沫若的思想学术观点一切皆是，而胡适一切皆非，而是呈现着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本着求实的精神，冷静的分析，才能按本来面目来认识他们。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继承他们的学术遗产。本书力求做到这一点，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这就只有请专家和读者来评判了。

由于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和论争，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本书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加以评述，只能就他们的分歧和论争的一些主要方面作介绍和评述。更由于胡适先于郭沫若“暴得大名”，在学术争论上也是胡适发表于

前,郭沫若批判于后,所以,本书在叙述上,一般是按争论的本来面目,即胡适先郭沫若后的顺序来进行比较和评述。

由于他们两人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学术大师,他们的成果数量很多,内容丰富,有些内容又相当高深和专门,进行比较研究,难度很大。因此,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参考并吸取了学术界人士许多的优秀研究成果,否则不能写成此书。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尽管如此,本书的缺点、错误定然很多,这是作者水平不高造成的,由自己负责。欢迎学术界同人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0年4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学术、

交往关系的历史定位 1

- 一、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胡适与郭沫若 1
- 二、“全盘西化”与“批判地摄取” 29
- 三、“整理国故”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51
- 四、治学指导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异同 69
- 五、在创立文学革命新观念上的立异和认同 93
- 六、对中国思想、学术现代化各自所作贡献述略 122
- 七、“朋友”、论敌和政敌 145

第二章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在先秦诸子和

儒书上的分歧 168

- 一、“打倒孔家店”与“袒护孔子” 168
- 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超越 188
- 三、在古代井田制看法上的同异 210
- 四、《说儒》与《驳〈说儒〉》 231
- 五、“扬墨抑儒”与“打倒墨家店” 252
- 六、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认同与立异 285
- 七、关于《周易》制作时代上的歧见 302

八、在《诗经》考证研究上郭沫若对胡适的继承和发展	316
九、屈原有无其人与《楚辞》作者问题上的歧见	337

第三章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几个重大歧见述评	357
一、对蔡文姬《胡笳十八拍》问题的歧见	357
二、“扬杜抑李”与“扬李抑杜”	369
三、《尝试集》与《女神》	392

第四章 当代学者对胡适与郭沫若思想

学术评论	411
一、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对郭沫若与胡适学术 成就的评论	411
二、唐德刚《胡适杂忆》对胡适郭沫若评论的评议	423

参考文献	441
------------	-----

附 录	448
-----------	-----

后 记	451
-----------	-----

第一章 胡适与郭沫若思想、学术、 交往关系的历史定位

一、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胡适与郭沫若

20 世纪前半期的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变革异常剧烈的风云剧变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内部的各阶级之间,殖民地国家内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均异常剧烈尖锐。以致引发了两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引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引发了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新高潮。就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复杂剧变的时代,中华民族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改变长期备受列强侵略凌辱的处境,跟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一句话,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富强和繁荣,走过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进入了由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经过近 30 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时代。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变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曾经登台演出过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悲壮活剧。他们或者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

武器,或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提出并实施过他们各自认为的最佳方案,取得过像辛亥革命那样推翻清代专制王朝的胜利,对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刻下了这样和那样的变革的烙印,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各个阶级的中国近代化方案都未能成功。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始终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继续起着进步作用,也有一些曾经在以往起过进步作用的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前进,以致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落伍了,有的人甚至逐步成了历史发展的绊脚石,混入了与潮流背道而驰的反动营垒。政治上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此,文化界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不例外。

当中国的近代历史翻到了五四时期,先前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重新调整了各自的位置: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盟军和追随者的工人阶级,登上了领导阶级的地位;而曾经是领导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日益下降为被领导的地位;曾经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的农民阶级,也转而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与此相适应,对西方进步文化的选择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在资本主义弊端充分暴露无遗,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思想武器,并从当时为数不多但却很有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中,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基础,这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就是在这样一个阶级力量重新配置、文化取向发生巨变的时期,胡适与郭沫若两位文学新人,先后异常活跃地出现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胡适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身份,郭沫若则作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崛起的新诗人脱颖而出。尽管开始时,他们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文化倾向,但是,随着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倾向都迅速趋异,胡适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郭沫若则由民主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忠诚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到了20世纪30年代,胡适更进而成为国民党的“文化班头”^①。郭沫若则成为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在文化上、学术上形成了全面的对立,进行过长期的论争。但是,他们在文化上的对立,最根本是起源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的对立。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比较研究,首先从政治对立上说起。

胡适(1891.12.17—1962.2.24),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人。他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兼茶商的家庭。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熏陶,1904年起在上海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1910年9月至1917年7月,作为第二批庚款资助的赴美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修完大学本科、博士学位的学业。回国后即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等职。

早年的胡适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民主主义的拥护者。早在1908年参与编辑的以“救国”为主旨的中国公学的《竞业旬报》中,他就发表过《读爱国二童子传》、《爱国》、《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②等文章,以书评、社论、传记等形式,点明“爱国”主题,宣扬爱国思想。后来,他赴美留学,开始选择学农,后又弃农学文,固然与他个人的志趣和出路有关,但也同时怀抱着“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愿望。在转学文科之后,他首先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继又翻译拜伦的

① 《王道诗话》,《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② 分别载于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主编的《竞业旬报》第28、34、32期。

《哀希腊歌》等,都是情词哀怨激励世人爱国的名篇。在美国留学期间,恰逢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他对这场革命是竭诚拥护和维护的。为此,他曾与英国人布朗德(J. O. P. Bland)在美国所进行的诋毁民国的游说,作过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①。后又专门撰写了《中国与民主》、《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文,批驳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共和与君主》所散布的谬论。同时对袁世凯出卖维新运动和复辟帝制的罪行表示谴责^②。凡此表明,学生时代的胡适,不但是一名爱国者,而且异常关心国内政治,是当时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拥护者和维护者。

就在国内反袁称帝斗争的严重时刻,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就在这个杂志上,胡适应陈独秀之邀,本着爱国救国的需要,把历年积思而成的关于文学革命的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上的“八不主义”和“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主张,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这是胡适关于文学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意见,也是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受到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在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后,胡适又写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胡适本人也因此“暴得大名”^③,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而登上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① 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② 《藏晖室札》卷十一之十三、十四。

③ 《暴得大名不祥》,《努力周报》第25号。

恰在这个时期,胡适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①。他说:“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起一个革新的基础”^②。所以,在五四爱国运动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他的大量论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③。

但是,形势比人强。政治作为各个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是任何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无法回避的。对于像胡适这样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④来说,尤其如此。

就在胡适发誓不谈政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却进入一个剧烈变动的重大时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以往人们所向往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的众多弊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先进的中国人心目中日益破产的情况下,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使西方的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并经过李大钊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长期受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文化的熏陶,笃信美国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欧美派知识分子和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的胡适,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从1919年7月在他接办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矛头直指当时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抛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开始他大谈政治的生涯。对此,他说:“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

①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② 《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67页。

③ 《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67页。

④ 《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66页。

上海的分赃和会还未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①。由于他的文章的主旨在反对以革命手段“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推销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对社会问题实行点滴改良，所以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的批驳。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从此以后，胡适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谈论政治的文章，在五四以后至大革命时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争自由的宣言》^②、《我们的政治主张》^③、《国际的中国》^④等。在这些文章中，他逐步抛出了一条以实验主义为指导，以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政治为目标，以改良主义为手段的自由主义路线。在当时的具体政治目标就是组织“好人政府”来取代北洋军阀的“坏政府”。这条路线，固然有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的一面，但就当时的主要矛头看，则是用来揭露和批判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反对当时“坏政府”的腐败政治的。正是这种两重性的表现，当时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人，虽然对他进行过批评，但仍把胡适本人与黄炎培等知识阶级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商人阶级一道视为“非革命的民主派”^⑤，把他视为革命联合阵线的团结争取对象。对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予以批评斗争，对其反对北洋军阀一面则予以

① 《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66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8月6日。

③ 《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

④ 《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⑤ 毛泽东：《外力革命与军阀》，《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4页。

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一直与他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而封建文人则视他为与陈独秀等一样的洪水猛兽,《胡适文存》还遭到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查禁。

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大革命,虽然推翻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以蒋介石为首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这个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①。所以,原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仅一个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矛盾反而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了。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残酷镇压,转入了地下,退却到农村进行武装斗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虽然一度追随国民党右派反对过共产党,但是,他们也没有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丝毫好处。经过一段时间,许多人也清醒过来,开始离开这个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走过了拥蒋反共又反蒋“争人权”的路子,并进而使自己的自由主义路线更加充实和完善起来。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抢夺大革命成果时,胡适正好从美国返国途中在日本逗留。他经过20多天观察研究国内形势,看到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站在蒋介石一边,资产阶级倾向南京政权,就公开表示赞成蒋介石的清党反共是“站得住的”,因为,他所敬重的蔡元培等人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②。他一度确立了拥蒋反共态度,试图在这个政权之下,施展其改良主义的政治抱负。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② 转引自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但是,胡适梦寐以求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望,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在回到上海后个人所遭受的冷遇,国民党所采取的党化教育,种种排斥异己,钳制言路,摧残人权,蹂躏民主,推行“人治”的种种专制政策,都使他不能忍受。这就使他很快从拥蒋转向反蒋,联合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创办《新月杂志》,并从1929年4月起,接连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文章,发起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争人权”的运动。在上述文章中,他列举国民党许多摧残人权的事例,直言不讳地批评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①;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是国民党人轻视人权的思想根源;要求国民党官僚“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②。他还列举国民党赞美封建旧文化、摧残思想自由、压制舆论、反对新文化、提倡复古主义的种种事实,说国民党的运动根本上“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其现实表现是“反动的”,甚至是“很反动的”^③。这样,他就成为当时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自由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言人。尽管他曾明确表示,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④,是“小鸟救火,旨在希望国民党改善统治‘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⑤,而无意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还是以其批评的原则性和尖锐性,表明他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存在严重的分

① 《人权与约法》,《胡适全集》第21卷,第386页。

②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胡适全集》第21卷,第434页。

③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第21卷,第440—441页。

④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第21卷,第441页。

⑤ 《人权论集·序》,《胡适全集》第4卷,第653页。

歧。正因为这样,他的批评极大地激怒了国民党政府,以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打击和“警告”。

差不多就在向国民党“争人权”的同时,胡适又发表了《我们走哪条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文章,在理论上全面阐述了他的自由主义的主张,试图借此进一步影响国民党,并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进行对抗。在文章中,他抛出了所谓“五鬼闹中华”论,提出中国的“仇敌”,“资本主义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中国的“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进而他指责:“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想必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所以,他反对这种有主义的“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实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他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统一的国家”,方法是走“演进的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功”^①。或者说,“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用防弊制度来经营商业,整理国家政治”,“用铁路与汽车路来做到统一,用教育与机械来提高生产,用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②,如此等等。他还攻击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是一种“化复杂为简单”的思想方法,要青年“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③。这样,他就把“问题与主义”之争时开始提出的自由主义路线,从理论到国情分析,从政治目标到进行方法,更加系统和全面了,因而也就更具有蛊惑人心的

① 《我们走哪条路》,《胡适全集》第4卷,第467页。

②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全集》第3卷,第31页。

③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73页。

作用了。

中国现代革命史已经证明,胡适关于中国国情的分析,是极其表面的,脱离实际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一种有产阶级的偏见。说明以他为代表的欧美派文人,高高在上,只是看到中国表面上的贫穷落后的现象,无视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事实,这个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他据以提出的建国目标和进行方法,只能是一些迂腐的空谈,当然也不会被他的视野之外的亿万劳动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正是因为这样,他的这套理论和方案提出之后,不仅遭到共产党人的批判,也遭到其他中间势力的批评。例如郭沫若就非常尖锐地指出说:“其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止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①。他认为,胡适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只是“在名词上玩把戏”,是“徒逞唯名的诡辩”^②。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也公开表示,胡适的论断与“三数年来‘革命潮流’相反”,而予以拒绝^③。当今的海外学者在反思这段历史时,也认为胡适所提出的目标,“只是对于遥远的目的地一种描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建设纲领和方案”,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没有具体的目标”^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适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作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所以不要说领导亿万人民谋翻身解放,就是《大公报》式的小骂大帮忙的文章也是写不出的。这是因为并非无此

① 《学生时代·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② 《学生时代·创造十年》,第146页。

③ 《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7页。

④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4页。